

欧洲文艺复兴史

刘明翰 主编

A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欧洲文艺复兴史

王挺之 刘耀春 著

城市与社会生活卷



人民出版社



A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欧洲文艺复兴史

城市与社会生活卷

刘明翰 主编 王挺之 刘耀春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 / 刘明翰主编 王挺之 刘耀春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01-006616-5

I. 欧... II. ①刘...②王...③刘... III. ①文艺复兴—历史—欧洲②城市史—欧洲—中世纪③社会发展史—欧洲—中世纪 IV. 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302 号

书 名	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 OUZHOU WENYI FUXING SHI CHENGSHI YU SHEHUI SHENGHUO JUAN
著 译 者	刘明翰主编 王挺之 刘耀春著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6.5
字 数	434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01-006616-5
定 价	49.50 元

总 序

历史长河，波涛起伏，滚滚向前。世界历史的画卷，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它既有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惊天动地时刻，又有漩涡险滩、曲折逆流的暂时倒退场面，还有那熠熠生辉、异彩纷呈的璀璨图景。多元景观和七色珠玑的文艺复兴，一如那异彩纷呈的图景，人们播撒着新的价值和理性精神的种子，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建了独特的新观念和文明内涵，唱响出一首迈向新时代的高歌。

现在呈献给读者们的多卷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一个研究项目。它是我国首次系统地梳理和全方位地阐释欧洲文艺复兴思想精华的一次尝试，也是多层次地探究文艺复兴成果和历史经验的纵深耕耘。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一直以其思想和文化的恢弘灿烂而备受世人瞩目。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代，是欧洲在意识形态层面开启的一场与封建文明决裂，在知识、科技、人文和社会诸领域中展开的一场新思想和精英文化的运动。它是以反封建、反天主教会、反对神学蒙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世纪晚期欧洲面临着总体危机。“阿维农之囚”后，教权下降，封建生产方式逐渐解体。人们由于信仰的失落和价值符号的错位，在时代转型的风云中，直面生存深渊，

渴望走出蒙昧的漫漫黑夜。学之染人，甚于丹青。欧洲文艺复兴画卷，充分揭示了先进文化和先进知识分子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启蒙作用。先进文化代表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导向和动力之一，它发挥着震古烁今、振聋发聩的精神解放的作用。直接将新兴资产阶级推上了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平台的中央。

自14世纪初至17世纪30年代共三百余年的文艺复兴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精神象征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的特定概念，其主要标志是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文艺复兴并非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文化的复活，而是利用古典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去反对封建的神学体系和经院哲学。人文主义在哲学观上表现为人本主义，政治思想上体现出民族主义，在伦理思想上集中表现为反禁欲主义，文学艺术上展现了现实主义。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主张发展人的个性、才智和自我奋斗，赞扬英雄史观；肯定现实世界和现世生活，向往享受、功利和致富，反对禁欲、悲观和遁世；否定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绝对服从，嘲笑僧侣的愚昧，蔑视贵族的世家出身，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制；提倡理性，追求知识和技术，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主张探索自然，欣赏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语言符号系统和各种表现形态。

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人看做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的本质和根源。“以人为本”就是反对人被边缘化，强调人在宇宙中心的主体性，肯定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它同时是一种价值功能取向，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是权利和责任的主体，描述人内心的丰富、刚毅和身体美；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否定封建文化和神学的主导地位，提倡人的个性，树立人的自主意识。“以人为本”的提出，发挥了积极进步的历史作用。然而，社会的积壳层岩永远不是一朝所能凿穿的，疏浚如导壅，发明如烛暗，人文主义思潮随历史的发展，其体系也是逐渐丰满的。

欧洲文艺复兴如怒海波涛，“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恩格斯语）。它敲响封建制的丧钟，改变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形

成，展示了近代曙光初露的黎明；留学意大利热潮中群贤荟萃，创造了精英文化；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获得了空前的繁荣；难以企及的佳作荣膺世界不朽名著之列；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者思想的萌育；近代自然科学和新人文科学迎着暴风雨诞生。文艺复兴史的经验证明，必须同反动势力渊藪和落后传统坚持长期斗争，不畏强暴，殚精竭虑，艰苦实践，才能与时代同步，结硕果，出巨人。

二

一个半世纪之前（1860年），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问世，他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又加以综合与发展，对文艺复兴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总结，把它作为一个文明整体加以阐述。这部巨著，是文艺复兴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流传甚广，成为西方史学中关于文艺复兴史正统理论的基础。布氏摆脱了欧洲传统史学只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史的传统，对先进文化加以颂扬，评析了人文主义，开始把政治同文化联系起来，在结构和体系上进行创新。但书中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期，是当时史学界的偏见；全书没有艺术的内容，将文化成就主要归功于一小部分君主和统治者乃其缺陷。英国史学家西蒙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同布氏观点接近的另一部正统派巨著，此书卷帙有七、内容浩繁丰富。设专章写美术和方言文学，专门论述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将不同城市辟专题加以分析，对但丁、莎士比亚等均列有小传。但全书缺少经济背景，政治事件较多，范围仍窄，是其不足。布克哈特的研究方法和传统持续到20世纪，许多著作，如《剑桥近代史》第一卷《文艺复兴》等，均采纳布氏的观点。

20世纪初，尤其在30年代，西方史学界一度盛行反对和批判布克哈特的史学传统。以德国史家H.索德、法国艺术史家L.孔诺德，特别是美国中世史家C.H.哈斯金斯和L.桑代克等为代表，他们指出，“中世纪并非黑暗和静止”，中世纪文化中有文艺复兴的源流，认为历史发展只是连续的渐进，甚至否认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文艺复兴研究上传统观点与反传统观点有过激烈论战。但一批学者仍沿着布克哈特的正统的研究道路前进。他们的代表人是汉斯·巴伦、保罗·克瑞斯泰勒和欧金尼奥·加林。他们特别注意文化和政治、社会的结合,将文艺复兴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从文化社会学、人文学和哲学等不同角度补充和深化了布氏的立论,为全面研讨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

20世纪50至60年代,许多史学家在坚持布克哈特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布氏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进一步拓宽了文艺复兴研究的思路,即:在研究领域上开辟了新的方向;在研究方法上开展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比较研究;拓宽史料来源,重视档案、文物典籍的作用;强调以点带面,将佛罗伦萨作为典型,探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和变迁。这一时期有关文艺复兴的成果显著,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20世纪80年代后,文艺复兴的研究有了重大转折。西方史学界由于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新史学”运动的影响,在研究方向上更集中地转向社会史领域;研究对象上,逐渐从文化名人转向广大群众;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对文艺复兴的概念、性质、时代和社会结构等基本理论性问题的辨析和定性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同时又广泛重视了史料的更新,对研究领域则进一步拓宽。在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5年在斯图加特举行)的文艺复兴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现出各国学者对文艺复兴兴趣的明显提高。

20世纪末,各国学者对意大利以北各民族国家中文艺复兴的研究成果激增;对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与社会生活,一些教皇对文艺复兴的态度的异同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经济、教育、建筑、妇女等诸多领域的探研均相继展开;特别是重视史料来源的扩大。这些在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9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中有所反映。美国的六卷本《文艺复兴百科全书》(1999年版)对文艺复兴人物、事件分别有新的概述。

我国在80年代以前,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基础薄弱,主要是少数学者对文艺复兴的背景、性质和意义作宏观分析,很少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80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20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

学会组织国内外学者们连续对文艺复兴史展开了一系列研讨,刊出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三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曾长期居世界前列,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有巨大贡献。中国的建筑技术、造船、航海、陶瓷与漆器生产等等许多工艺曾在世界领先。14世纪前,世界重要的科学成就和发明约300项,其中出自中国的约175项,占57%以上。但文艺复兴后期,由于西欧自然科学一系列发现、发明以及政治经济、海外贸易等都有新发展,而在封建围墙内长期徘徊的中国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文化专制,以致从这时起同西欧的差距拉开并逐渐扩大。我们祖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的?落后的根本原因何在?从欧洲文艺复兴前后中西历史的对比落差中最能找到端倪。

恩格斯以高屋建瓴的眼界进一步对文艺复兴做出了高度也最正确的评价,他指出“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目前,我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全面、多角度地审视欧洲文艺复兴仍是一道难题。迄今,对它主体多层性研究阙如,薄弱和空白环节较多。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东方文明、地负万物、海纳百川的悠久古国,炎黄文化的精华博大精深,传承文明和借鉴中外文化精华,历来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国人治史”戛戛独造的胆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进一步开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恩格斯对文艺复兴的正确评价作为这部丛书全面贯彻的指导思想,充分探究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欧洲文艺复兴史》分成各有主题而又互有联系的十二卷,即:总论卷、经济卷、政治卷、哲学卷、科学技术卷、文学卷、艺术卷、教育卷、法学卷、宗教卷、史学卷、城市与社会生活卷。这样多卷本的范围和规模,在国内尚属第一次。我们力求恪守严谨、创新的原则,在汲取国内外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体现出“自得之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全书的基本框架虽统一，但各卷出自众手，写法和文风、笔调不可能也不必千篇一律。我们由衷的愿望是想通过这部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可鉴之镜。

回眸自2001年起，全体作者以求实的学术品格，齐心协力，迎晨霜晓露、伴午夜孤灯，焚膏继晷，辛勤笔耕，其合作态度和钻研精神令人感动。本书的框架、重点、难点及各卷初稿，是在四届审稿会反复切磋和研讨后解决和定下的。每卷的内容和文字都经由编委会成员和主编审定。尤为感人的是本书得到人民出版社领导和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编审、责任编辑杨美艳的大力支持、督促和具体指导，特此衷心致谢。尽管我们努力进行创新探讨，但有关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系统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尚在不断衍化发展之中。我们的学力不逮，限于水平和资料，各卷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论述欠充分或粗疏漏误之处，渴望得到专家、学界同仁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刘明翰

2007年3月

导 论

文艺复兴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是为国际学术界相当一批学者接受的观点,同时也是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古典学术得以复兴,艺术在古希腊罗马之后再一次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峰。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典文化的表达方式率先打破了欧洲的沉寂和平静,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继而引发了欧洲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已经在事实上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文艺复兴这一具有特定意义的时代概念,亦在人类文明史上据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在欧美学界,文艺复兴研究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自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出版以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使文艺复兴研究成为西方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总体上看,欧美学界的文艺复兴研究尚存在两大不足之处:一是把文艺复兴与它的历史场景相割裂,就文艺复兴文化谈文艺复兴文化,结果导致以文艺复兴文化任意拔高这个时代的倾向。二是过分偏重精英人物和精英文化,忽视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普通民众、女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受“新史学”的影响,欧美的文艺复兴研究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对文

文艺复兴时期大众的历史和大众文化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必须把文艺复兴和它的历史场景结合起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由于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是在意大利城市社会里发生,故而二战后的欧美文艺复兴研究往往和这一时期的城市史研究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难分彼此。若从城市史的研究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欧美文艺复兴研究具有如下两大趋势:

其一,宏观研究少,个案研究多。这里所说的宏观城市史著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讨论欧洲城市的通史性著作,这类著作中通常都包含有论述意大利城市的内容(但这类通史性著作的时间范围并不限于“文艺复兴”),另外,关于中世纪晚期或近代早期的城市史著作也可能涉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另一类是专门概论意大利城市史的著作。总的来说,宏观的城市史著作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单个城市作为考察对象,尤其以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居多。近些年来,欧美文艺复兴和城市史研究出现了向小城市转移的趋势,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小文化中心,如那不勒斯、乌尔比诺、帕多瓦、费拉拉、热那亚、都灵等,皆有相关研究著作问世,由此可以看出,文艺复兴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美国的《文艺复兴季刊》(Renaissance Quarterly)和英国的《文艺复兴研究》(Renaissance Studies)等学术刊物也不时刊登关于文艺复兴城市的研究成果。如何在宏观研究和个案研究之间取得平衡是任何一位文艺复兴学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二,学科交叉研究流行,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日趋多元化,并形成了一些相对独立的领域:

1. 比较城市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法国巴黎大学的城市史家勒斯托库瓦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的《市民阶级的起源:显贵统治下的弗兰德尔城市与意大利城市》泛论城市显贵的起源,并试图在历史的发展中勾勒欧洲南北城市显贵形成的过程以及特征。他强调说,城市显贵正是从这个“市民阶层”中分离出来的。他们是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阶层,这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城市政府,掌握了政治大权。在他看来,所谓的“市民阶层”(bourgeoisie)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很大

的差异，这一点至关重要。虽然该书对城市显贵的起源做了很有启发性的探索，但是对于城市显贵阶层的未来发展和集体认同缺乏更细致的界定。这个问题在后来的两项类似研究中进一步得到细化。

英国城市史家亚里山大·科万在对威尼斯和德意志地区的吕北克做了比较研究后，对城市的显贵阶层作了这样的界定：城市的显贵主要由那些在城市里拥有最大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家族构成。他强调，在16和17世纪城市显贵势力依然十分庞大，他们都更乐于接受贵族文化。不过，威尼斯和吕北克的城市显贵在形式和构成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前者更保守更封闭，而后者更开放，社会流动性的程度大大超过前者。^①

英国剑桥大学的史学家彼得·伯克对近代早期威尼斯的贵族阶层和阿姆斯特丹的精英阶层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这两个城市是17世纪欧洲南方和北方城市中的最佳样品，无论是在宗教（天主教和新教）、家族观念、家庭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伯克尤其借鉴了社会理论家，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美国政治学家C. 莱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和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等人的“精英理论”，他没有用“城市显贵”一词，而是使用了更加中性的“精英阶层”，也就是在社会地位、权力和财富上处于主导地位的阶层。他从城市精英阶层的构成及其财富、教育、文化赞助和艺术品位、生活方式等方面比较了两个城市的精英阶层的异同。在伯克的分析中，有一对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即“企业家阶层”（entrepreneurs）和“食利者阶层”（rentiers），这对概念是他直接取自帕雷托，并略加改造。伯克指出，这两个城市的精英阶层都经历了一个从追求风险利润的“企业家阶层”向趋向保守的“食利者阶层”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导致两个城市从辉煌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显然，伯克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历时性和动态分析城市显贵阶层的概念构架和范例。但是，上述的三项研究在时间上要么是靠前，要么是靠后，恰恰忽略了我

注
释

① 科万：《城市显贵：吕贝克和威尼斯，1580-1700》（A. Cowan, *The Urban Patriciate: Lübeck and Venice, 1580-1700*），科隆1986年版，214-221页。此书仰仗全涛博士在德国复印，谨此致谢。

们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1350—1600)的城市上层的分析,笔者将在本书中对此提出自己的一种尝试性探索。^①

上述研究都具有共同之处,不仅是研究的对象具有很大的相似形,也就说,研究的焦点都聚集在城市的精英阶层。上述研究至少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探索城市显贵的形成,以及比较这个阶层与旧的封建土地贵族之间的异同,深入理解欧洲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社会分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上述比较研究的样本分别取自欧洲的北方和欧洲的南方,南北城市之间的差异或多或少揭示了同一时期欧洲南北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差异。我们在研究欧洲社会的历史演进时,不能忽视区域之间的差别,否则我们就容易犯简化主义(reductionism)的弊病。

2. 城市建筑、城市规划和城市景观。这一领域不可避免涉及专门的建筑学知识和城市理论,因而往往是建筑史家、城市理论家和城市地理学家的专长,一般的历史学家由于缺少相关的专业训练,往往望而却步,在涉及相关内容时不得不倚重建筑史家的研究成果。当然这只是就总体的情形而言,并不是说一般史学家就完全从这个领域退出,例如,主治妇女史的琼·凯利-加多尔(Joan Kelly-Gadol)和主治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就分别撰写了关于文艺复兴建筑理论家阿尔贝蒂的研究著作,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与一般的建筑史家所不同的是,历史学家更多地是从历史的整体性中理解建筑和空间结构,换言之,总是把空间结构与它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考察,而不仅仅是就建筑谈建筑。由于文艺复兴建筑和城市规划在西方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相关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要一一细读和评介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举出最有洞察力和新意的著作,威尼斯建筑大学的女建筑史家多纳泰拉·卡拉比的新著《文艺复兴早期的城市》就是比较出色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优点在于她善于把文艺复兴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典型和一般趋势进行了很好的结合,这样既做到了叙述大势,又做到了重点突出,是一本很好的著作。

注
释

^①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城市社会的等级结构”。

3. 城市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是过去二、三十年文艺复兴城市史研究中的亮点。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城市的公共生活尤其有用。当然,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并不是“新史学”兴起后才有的新事物,其实,早在19世纪,文化史家和社会史家已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斯凯夫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生活》和莫尔门蒂的《威尼斯私生活史》。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史学界的中心或主流是政治史和外交史,其他形式的史学,包括文化史和社会史都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因此,这些著作虽然新颖,却并未产生太大影响。近年来,这些著作被重新翻印,显然与如今史学界对社会史和日常生活注重有很大的关系。在新史学,尤其是“日常生活史”(法国和德国史学家在此领域的贡献尤其大)崛起后,史学家开始严肃对待城市社会生活的研究。具体地说,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可划分为两大类型:城市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

就公共生活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文艺复兴学界出现了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即特雷克斯勒(R. Trexler)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和缪尔(E. Muir)的《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市民仪式》。这两部著作把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引入文艺复兴城市社会研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人们习惯上把仪式看成是一种空洞的表演形式,缺乏实质性的内涵。特雷克斯勒和缪尔的研究表明,与人们的常识相反的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虚的仪式却有很实在的内容和功用。他们都敏锐地注意到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公共仪式是城市生活中最显著的一部分,在塑造城市认同(urban identity)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两位史学家最吸引人的的是他们对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城市仪式的功能的分析。特雷克斯勒详细阐述了仪式在政治和外交、公共庆典、以及危机时刻的作用。除功能性的分析外,他还注重动态地考察文艺复兴时期仪式的演变,他在书的最后部分剖析了佛罗伦萨的“仪式革命”,即16世纪早期在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作用下的仪式形式和内容的剧烈变化。仪式在威尼斯的城市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威尼斯的统治阶层一直在宣扬一个“威尼斯神话”(mito di venice),“威尼斯神话”的核心内容是宣扬威尼斯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冲突的“宁静的和谐社会”(la serenissima),很显然,这是威

尼斯人构建的一个有关威尼斯城邦的意识形态。缪尔详细地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仪式，他的研究告诉人们，仪式绝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而是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威尼斯的统治阶层正是通过一系列仪式宣扬和巩固“威尼斯神话”，从这个意义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是一个依靠仪式进行统治的城邦。这两项研究凸显了仪式和象征文化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两部著作也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对话趋势在加强。

对城市私人生活的研究往往与家庭史重叠，法国史学家集体编写的《私生活史》和《家庭史》首开先河。^①私生活史意味着首先必须对人的生命周期，即生老病死各个阶段进行一个动态考察，其次要分析人生的几个关键阶段的童年、成年和老年如何界定，又分别意味着什么。此外，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庭记忆也都成为史学家高度关注的问题。美国学者E. S. 科恩和T. V. 科恩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日常生活》是第一部全面展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日常生活的著作。不过，从总体上看，对文艺复兴时期城市贵族的私人生活，包括其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情感生活的研究最为突出。帕特里西亚·布朗着重考察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贵族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围绕着显贵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娱乐生活等展开。^②一些艺术史家则孜孜不倦地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城市显贵们的家庭的内部装饰，换言之，他们关心的是显贵们如何用新的艺术形式塑造和美化家庭生活。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相当一部分艺术品都属于室内装饰的范畴。由此可见，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艺术性是当今文艺复兴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些微观史学的实践者则把目光转向了人们的情感世界，爱与恨也开始成为史学的题材。文艺复兴史家布鲁克尔利用档案资料讲述了文艺复兴时期乔万尼和卢萨娜这对恋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揭示了当时的婚姻和爱情观念。

注释

① 阿里埃斯和杜比主编：《私生活史》（P. Aries & G. Duby eds.,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 1-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该书第一卷已有中译本（《私人生活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1-3卷，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② 帕特里西亚·布朗在其《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私人生活》（Patricia Brown, Private Lives in Renaissance Venice, New Haven, 2004）。

对城市私人生活的发掘和重建使我们对以往所忽略的私密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情感世界进入史学家视域表明作为历史整体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情感维度(emotional dimension)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了。

4. 城市文化史。近年来,城市史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城市的文化生活,如音乐、戏剧和舞蹈等。在这一领域,成果最丰硕的不是城市的精英文化史,而是城市的大众文化,特别是工匠阶层的文化。与以往注重艺术和文学等的精英文化史不同,新兴的城市文化史研究侧重于物质文化、大众文化,即所谓的“新文化史”。物质文化是法国年鉴派学者十分重视的一个领域,但过去,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现在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则强调从文化史的角度入手。目前,在城市物质文化的研究中,对城市居民服饰文化的研究最突出,如弗里克的《佛罗伦萨的服饰:家庭、财富和锦衣》就深入研究了城市上层的服饰文化。另外,相关研究还有斯图亚德的《14世纪意大利的奢侈与时尚》、魏尔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购物》等。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物品史”(history of objects)成为物质生活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亮点,如《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物品传记》。^①

除物质文化史之外,受“下层史”和“文化研究”潮流的推动,城市史家日益关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大众文化。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威尼斯大众文化的研究尤为出色。美国文艺复兴学者R. C. 戴卫斯则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他的《威尼斯造船厂的造船工人》深入剖析了工匠们的生活世界和文化创造。另外,他还在《拳战: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的大众文化和公共暴力》一书中分析了暴力的“仪式文化”。^②

5. 性别研究和少数族群研究。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和

注
释

① 奥尔森主编:《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物品传记》(R. Olson ed., *The Biography of the Object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 Oxford: Blackwell, 2006.)

② R. C. 戴卫斯:《威尼斯兵工厂的造船工人》(R. C. Davis, *Shipbuilders of the Venetian Arsenal*, Baltimore, 1991); R. C. 戴卫斯:《拳战: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的大众文化和公共暴力》(R. C. Davis, *The War of the Fists: Popular Culture and Public Violence in Late Renaissance Venice*, Oxford, 1994.)

性别理论对文艺复兴研究产生了强烈冲击。不少学者开始尝试把城市史和妇女史结合起来，考察城市妇女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经历等。从总体上看，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一是当时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意识形态压制；二是妇女与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三是城市妇女在多大程度上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影响，就目前来看，在这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地是对妇女文化赞助的研究，尤其是上层妇女、艺妓和修女的文化赞助；四是女性对自己处境的反思和某种程度的反抗。^①

自巴勒斯坦裔的美国文学批评家赛义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出版其《东方主义》(Orientalism) 以来，后殖民主义对史学研究产生强烈的冲击。欧美学者也日益关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他者”的命运。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大屠杀”的反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欧洲历史上少数民族民运的研究。受此思潮的影响，文艺复兴学者也重新关注城市社会中的少数族群，尤其是不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生存状态以及对文艺复兴文化的贡献。还有一部分学者则着力重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东方形象，这既包括与欧洲比较接近的拜占廷人和穆斯林（如土耳其、阿拉伯人），还包括文艺复兴晚期被欧洲人发现的“新东方”——如传说中的印度（东印度和西印度），以及遥远的中国等。

6. 城市生态史和环境史。近年来，生态环境史异军突起，成为国际史坛的显学。受此学术潮流的影响，一些城市史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城市的生态和环境史。美国学者库彻在其《意大利锡耶那城的供水系统》(M. Kutcher,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of Siena, Italy, New York, 2005) 深入探讨了托斯卡纳地区的山城锡耶那供水系统的历史，尽管库彻从事的是一项关于锡耶那供水系统的个案研究，但是他的研究揭示了前工业时代城市用水问题的困难，对我们了解托斯卡纳地区的山城供水情况颇有启发性。巴黎四大的史学教授巴旺教授在其《威尼斯的凯旋》(E. Pavan, The Triumph of Venice, Baltimore, 2003) 一书中从生态和环境史的角度重新诠释威尼

^① 参见刘耀春：《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76-187页。